

曹禺传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曹 禺 传

田本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田本相同志很早就从事曹禺研究，《曹禺传》是他继理论专著《曹禺剧作论》之后，撰写的一部具有文学色彩的传记。

作者用曹禺的生活历程和创作道路做主干，用与曹禺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为枝叶，浓墨重彩地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剧坛上的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

作者在评价曹禺及其创作中的历史把握和艺术感受，使他比较准确地写出了剧作家曹禺的历史风貌，画出了曹禺性格的基本特征。这是一部有特色的作家传记。

曹 禺 传

Caoyu zhuan

田本相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352,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600

ISBN 7-5302-0065-8/1.66

定 价： 5.30 元



曹禺 1985年摄于原北京三座门大街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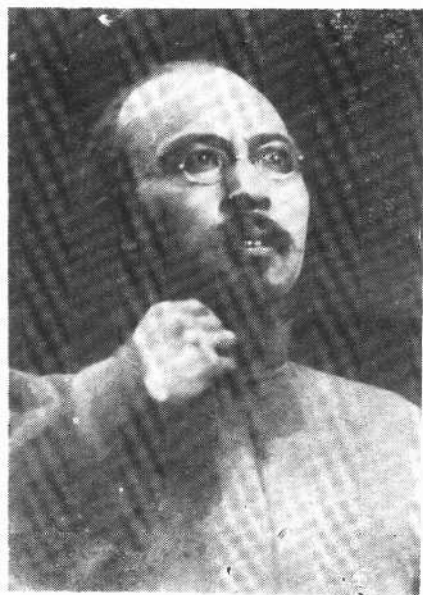


上图 1935年于天津
演出《财狂》，曹禺扮
演韩伯康



抗战时期的曹禺

右图 1936年于南京
演出《雷雨》，曹禺扮
演周朴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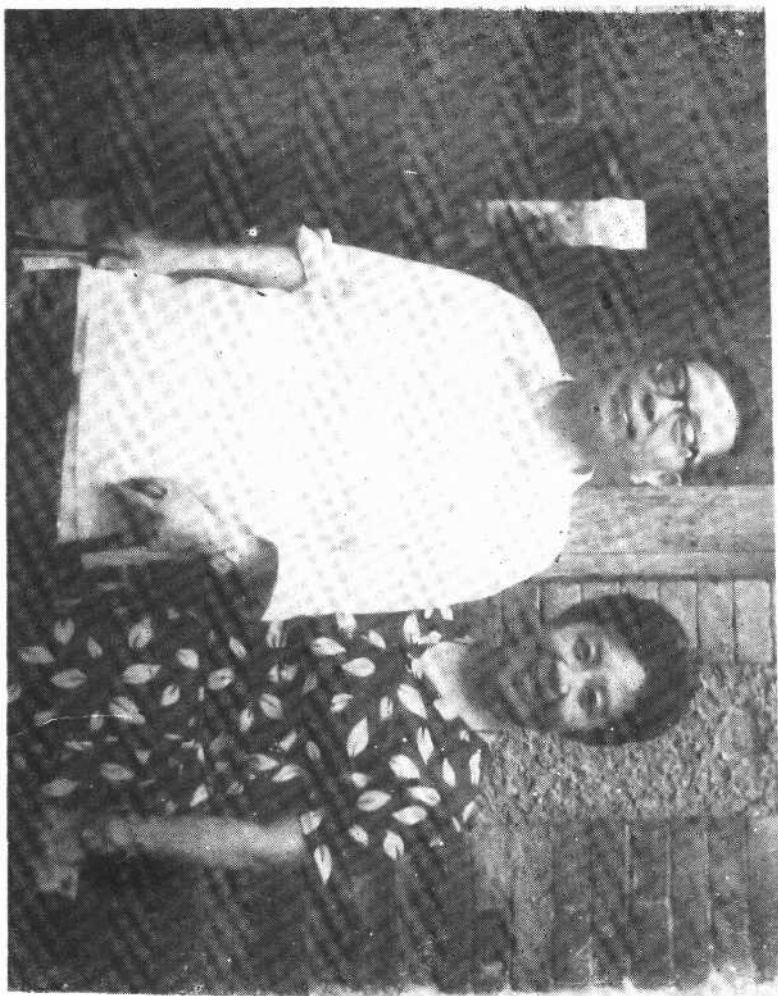




与本书作者田本相摄于北京（1985年）



曹禺在天津寻找旧居



曹禺和夫人李玉茹（一九八五年）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的苦闷	1
第二章	小戏迷	15
第三章	“寥人之子”	27
第四章	初试锋芒	38
第五章	诗的迷恋	52
第六章	在南开新剧团里	66
第七章	绽露表演才华	78
第八章	大学生活	89
第九章	人生的探索	107
第十章	转学清华	118
第十一章	虎虎生气	129
第十二章	《雷雨》的诞生	142
第十三章	重返天津	157
第十四章	《日出》问世	174
第十五章	执教剧校	188
第十六章	《原野》的创作	205
第十七章	流亡路上	219
第十八章	江安岁月	239
第十九章	海内存知己	260
第二十章	登上峰巅	272

第二十一章	同巴金的 友 谊.....	288
第二十二章	再上舞台.....	302
第二十三章	两部史剧的夭折.....	316
第二十四章	赴美讲学.....	330
第二十五章	盼望艳阳天.....	350
第二十六章	“一片新的天地”.....	359
第二十七章	试写新生活.....	375
第二十八章	日本之行.....	389
第二十九章	寒凝大地《胆剑篇》.....	402
第三十章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416
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430
第三十二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447
第三十三章	曹禺热.....	460
第三十四章	“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475
后 记		491

第一章 童年的苦闷

日本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写过一部名叫《苦闷的象征》的书。他说，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当然，这种看法不无偏颇之处。如果说苦闷对艺术创造是相当重要的，也不是毫无道理。这点，对曹禺来说，倒多少有点真实性。他曾对我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

的确，曹禺从小就有着不少的苦闷，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他上中学时，才不过十几岁，他的父亲就对他：“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理解儿子的内心苦闷，说来都会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从曹禺的家境来说，他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里有各种佣人：拉车的、做饭的、看门的、打杂的，还有保姆等等。生活优裕得很。按理说是不该有什么可愁的可苦闷的；但是，他偏偏却有着许多苦闷。他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那时我的确是苦闷的啊！”家庭生活的优裕，不但没有给他增添欢乐，反而成为他痛苦的渊藪了。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曹禺先天就带有忧郁的血质，以致从小就忧心忡忡，心怀苦恼。这自然是说不通的。尽管曹禺的父亲不能理解儿子的苦闷，但要理解曹禺的苦闷，还得从曹禺的

父亲的苦闷谈起。原来，曹禺的父亲也是一个苦闷盈胸的人。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是个天才。可是，你要从他那里去了解他的父亲，了解他的家世，他却不能给你一个详细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说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对他父亲的脾气和性格，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却说不清楚他父亲的确切履历，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个性。他对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并不是家里人未曾对他讲过万家的家族史，而是他从不记忆这些“家庭琐事”。他不是故意不记，而是他的大脑不储存这些信息。因此，当人们问起他的家世时，有许多事他说不清楚，讲不出个来龙去脉，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对于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总是摇着头，喟叹一番，而终于说不出一个究竟来。有时，这使来访者格外扫兴，这确是无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时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他说他六七岁或者八九岁曾随父亲到过宣化，但究竟是几岁，他始终不能说出个究竟来。除非你调查来一些事实材料，再问他，那也许会从他的记忆库存中又引起一些回忆，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说个明白的。要么，他就干脆说，这件事你去问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连细节都记得十分真切具体。他念过的书，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国总统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说，他还能用英文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起曹禺的家世，得亏还有几篇资料，还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长辈万枚子的回忆记录，使我们对他的家族史有个粗略的了解。这对了解曹禺，特别是了解他的父亲是很有帮助的。

曹禺的父亲，名叫万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人。他一辈子都梦想光宗耀祖，实现万家祖辈代代相传的理想。但是，他闯荡一生，却没有实现祖宗的理想和愿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万家的家世，就懂得万德尊的苦闷了。

据说，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江西省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有个叫万邦的武官，因为当时天下扰攘不安，他便宜游到今天的湖北省潜江县定居下来。这样，万邦就成为万氏的支脉在潜江的始祖了。万邦娶妻杨氏，万家的子孙便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长。最初的几代没有什么可考的事迹。到了万邦的八世孙万廷琇出生，其时正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万家开始有些起色。嘉庆五年（1800），廷琇的长子时叙出生，时叙字惇五，号珏田。嘉庆二十三年（1818），廷琇恩贡，候选州判。时叙不如父亲，只做了郡廪生，后来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间，时叙给一个病人看病，大概是误诊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缢身死。从万廷琇开始了万家的奋斗史，那就是靠读书而入仕途。但是，这条道总不能如意，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依然不能振兴门庭。这样，万家的奋斗史就成为失败史。

时叙的儿子际云是道光三年（1823）十月八日出生的。际云榜名骏，字番卿，号祥五，娶妻魏氏。际云本有发迹之望。咸丰九年（1859），际云恩科中试本省乡试举人，同治元年（1862）会试考取觉罗官学汉教习，敕授文林郎，揀发甘肃知县。谁能料到际云却碰到了晦气的命运，于赴任途中，因受随同行同伴眼疾传染，突然双目失明。只得回家重操祖先遗业，又当起私塾先生。际云的长子名启，又名启文，字紫邨。自幼为教私塾的父亲笔录讲义，后来也以授课为业。启文先娶妻杨氏，杨氏聋哑，后又娶徐氏为妻。同治十二年（1873），启文与杨氏生一子，名德尊，字宗石，这就是曹禹的父亲。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私塾先生在乡村表面上受人尊敬，实际上却是地位寒微，生活贫困自不待言，也为官宦财主人家所不齿，饱尝着世态炎凉的苦涩酸辛。这样，

一代又一代苦读而不得发迹的家族命运，使万德尊从小就深刻地体验着一个贫穷人家的艰难和耻辱，万家的失败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凭着苦读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振兴家业。在乡里，德尊有“神童之誉”。天资聪颖，又很用功，15岁便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稍后，便毅然离开家乡，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德尊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养家糊口。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他省出一半来寄给父亲，接济家用。他常说他是“窶人之子”，“窶人”是湖北潜江土话，就是穷人。他是多么想摆脱“窶人”的命运啊！

贫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寻一条发迹的道路。那时，可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这条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过了，这是一条风波险恶而希望渺茫的路。到头来都碰了壁，还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条是靠亲友的介绍去当学徒，去经商，去做幕友。但是，万家没有得力亲朋故旧可攀。这条路实际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留学外国之风也开始兴起。留学外国似乎是一条新路，但这是一条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这样的机遇摆在德尊面前了。面对这样一个前程未卜，不知吉凶祸福的机会，使他踌躇起来。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出国学洋务是很不光彩的。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是一条歪门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有时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德尊看到科举道路的渺茫，经商又无门径的时候，他以为学洋务也许是个机会，能够实现夙愿。于是，便下定决心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去争得一个好前程。好在还有他的舅舅与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气。

光绪十年（1904）六月，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

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就读，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陆军学校是很有些名气的，在日本也算是较老的军官学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国同学有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还有黄国梁等。^①鲁迅是光绪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②万德尊也是在这种“又要维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万德尊于1909年初学成回国。回国后，便被委以军职。不过，他没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据说，当时直隶总督端方对德尊颇为器重，任命他为直隶卫队的标统。标统，按现在的军职来说，相当一个团长。从万家的家谱来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终于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较之当私塾先生不知要强了多少倍。按说，他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总觉得他不当武官，也许他就不该去习武。他那文人的习性改不过来，他喜欢舞文弄墨。因之，他当了标统不但未能使他如愿以偿，反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内心深处交织着苦恼和忧郁。

万德尊当官的年代，正是满清政府面临覆灭的前夜。种种腐败相已暴露无遗。1909年1月，清改年号为宣统。载沣玩弄假立宪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以维持垂死的封建统治，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掠夺侵吞，清政府媚外卖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两湖一带发生

①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同学姓名调查录》

②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旱灾水灾，米价飞涨，饿殍遍野，不断发生抢米抗捐风潮，只1909年全国各地群众反抗斗争就达130多起。直到1911年初，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先有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继有全国的保路风潮，而终于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次民主革命的大动荡中，万德尊并没有被革命赶下台，当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得大总统的职位后，他也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武将，而且不久，还被授于陆军中将军衔，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相当一个师长。

民国之后，万德尊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颇得力于黎元洪的提携。黎元洪当大总统时，他还做过黎元洪的秘书。但好景不长，随着黎元洪的下野，他也只好弃官避居天津，从此赋闲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国初年军阀混乱的年代，各派军阀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表演，成者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有的军阀铤而走险青云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马来。万德尊不走运，他被混战挤轧出来，便再无心去挣扎了。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可攀的关系，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阎锡山就曾邀请他出来，但是，他不愿再干了。他没有再出去做事，也许他厌倦了军阀混战的乱世，也许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就像他的老同学阎锡山那样盘踞一方成为军阀，他不愿去冒那种风险。曹禺说：“我父亲做官不得意，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坚决反对我去做官。虽然，他做的是武官，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不是那种秉性黷武之徒。”^①相反，曹禺说：“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联。有时又满腹牢骚，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这一方面的性格，后来影响我在《北京人》

^① 曹禺同笔者谈话记录，1981年7月28日。

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如曾皓、曾文清、江泰。”^①他在天津当起寓公，抽上鸦片，那种没落文人的习性倒使他苦闷异常，那光宗耀祖的愿望也化为泡影了，他被打败了。不是万德尊一个人，而是像他那样的一批人为历史所淘汰了。他有时不甘心，可他又不愿像有些军阀那样在乱世中去投机，去冒险，加之，他没有冒险家的胆量，这就不能不使他内心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和苦闷。他才40岁，就觉得老之将至，潦倒不堪。或成日和几个朋友一起饮酒赋诗，或躺在烟灯前面，在烟雾缭绕中麻醉着自己。他发脾气，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似乎什么他都看不顺眼，他内心苦闷极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闷又给他的家庭带来多么沉闷而抑压的空气。曹禺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和家庭的：

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30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其实，我们都是父亲，只不过不同母罢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40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

^① 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

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①

每当曹禺向别人谈起他的父亲、他的家庭，都是这样说的。一个如此沉闷而令人窒息的家庭，又怎么能指望曹禺有一个心情欢悦的童年生活呢？

万德尊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赋闲在家，经常约些朋友一起饮酒赋诗。他结识的朋友也多半是些闲人。曹禺曾对我说：“当时和我父亲交往的有一位周七爷（又叫周七猴），他是周叔弢的叔叔。还有一位叫姚纪祥。还有一位方先生，我称他叫大方先生，曾做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的老师，扬州人。他专门搜集各种古代钱币，把它围在腰中。他还教过我几天书。他干涉我家的事，鼓动我大哥逃走。”^②这里说的周七爷，他家是天津一个著名的封建买办官僚的大家族。他的哥哥是周学熙，1912年在袁世凯的政府里做过财政总长，曾经参加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的卖国借款合同，但没有多久就下台了。周学熙依恃和利用袁世凯的势力进行工业投资，在河北省乃至天津形成了一个以周学熙为首的工业财团，如唐山的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耀华玻璃厂，直到天津的华新、中天等厂，都属于这个官僚买办财团的控制范围。万德尊因为和周七爷的过往关系，也把自己的钱存到这个财团的银行里，因此曹禺从小也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观察周家这个官僚买办家庭的生活，了解这个大家族的许多人和事，甚至熟悉这个财团的兴衰荣枯的变迁。曹禺说：“周家和我家是世交，我到他们家去过。周家的摆设很气派，《雷雨》的布景就有周家的印象在内。

①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曹禺剧作论》（田杰相著）第362页。

② 曹禺同笔者谈话记录，1981年7月28日。